一、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败降

山东社会科学院　赵延庆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败投降是亚洲太平洋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共同抗击、奋战的结果。除了正面战场、解放区战场等一些具体问题，总体上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国内史学界似已不成问题。但是国际“二战”史学界特别是欧美和前苏联的一些有影响的“二战”史著作，看法却大相径庭。在他们的一些“二战”史著作中，无论是中国战场的内容所占的比重、分量，或有关论断性的评价，都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有的著作对中国战场很少提及，即使有所涉笔，也如蜻蜓点水，惜墨如金。那么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谁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呢？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前苏联有人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起了决定作用。美国有人说，他们两颗原子弹起了决定作用。欧洲学者有的说“美国几乎是单独承负了对日战争的重担”，“即使当时中国停止了战斗，战争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①]。至于美国内部，空军和海军又各自强调本军种的决定性作用。美空军的对日战略轰炸调查报告认为，美空中优势压力足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美海军司令金说，单是海军封锁就可以使日本人投降[②]。日本前侵华军官和右翼势力则大多认为日本败于美国而没有败于中国，甚至认为日本向中国投降是“胜利的一方向失败的家伙投降”[③]。照此说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中，中国战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壮烈抗战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了。中国人民不但对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大搏战没有做出多少贡献，倒是需要别人来解放，因为“光靠自己，中国是无力赶走日本人的”[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离历史实际的评价呢？推其原因，从客观上说中国经济、军事落后，缺乏现代化装备，没有像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那样歼敌数十万乃至百余万人的大会战。从西方军事家、史学家来说，他们除了受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中国的抗战特点是地广人众、以弱敌强、实行顽强持久的全民族抗战，特别是对华北等敌后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缺乏认识，习惯于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那种传统的正规战、阵地战作参照系来看待和估价中国的抗战。日本评论家谷川庆太郎曾经问《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日本前陆军大佐、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中国战场……各地的游击战，让日本军队饱受其苦，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为什么没有呢？”服部回答说：“我们是正规军，所谓战史记述的是正规军之间的战斗，所以考虑到游击战之类并不能构成改变战局大

势的因素，就省略了”[5]。姑不论其对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游击战争作用的偏见，即使从军事学理论上说，这种观念也是陈旧的。从中国方面来说，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互相攻责无形中对于国际上对中国战场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再者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新闻封锁和延安传播手段的限制，除了少数外国记者、美军观察组成员和跳伞到解放区的盟军飞行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的抗战情况有所了解外，国外对敌后人民游击战争大多不甚了了。当然国外也不是都漠视、否定中国抗战对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贡献和作用，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等一些政治家、前苏联等国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学者对中国抗战从各自的角度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和较高的评价，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充分。

鉴于上述情况，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对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贡献和作用，有必要做一探讨。

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巨大贡献和重要作用

（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军民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1. 毙伤了大量日军。

1937年1月1日，日本陆军常备兵力为45万人，到1938年1月1日，即猛增到95万人[6]。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军民的广泛抗击，使日军遭到重大损失，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统计推算，1937年至1941年前四年半，日军死亡近33万人，伤130多万人，总计伤亡163万多人[7]。在此期间的侵华日军虽不全是精锐师团，但比战争后期仓促扩编的日军的素质要高得多，因此，一百数十万日军被毙伤，是对日本军事实力的重大消耗。

2. 消耗了日本大量战争资材及其再生产能力，造成其战争物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

①能源和原材料缺乏。石油是现代战争最基本的战略物资之一，日本自身基本不产石油，主要依靠进口，战前储备并不充足，由于侵华战争的大量消耗，加上后来美国实行禁运，石油日益紧张，以致不得不搞人造石油，甚至大刨松树根，提炼“松根油”。煤、电等也同样紧张。1939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实施煤配给统制；1940年2月10日由于“电力饥馑”，被迫实施“电力调整”[⑧]。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原材料同样紧张，也实行了“配给统制”。1938年后，工业生产逐年下滑，1940年钢铁产量比1939年下降了25%，1941年，许多重要产品的计划都没有完成，煤炭完成70%，钢材60%，铜只有53%。“日本就这样走上了国力崩溃的道路”[⑨]。

②食粮严重缺乏。随着侵华战争越陷越深，日本人主食大米的匮乏日益严重。日本内阁于1939年10月6日决定限制米的捣精度，就是说禁止加工白米，只准加工糙米，这样仍不能解决问题，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近畿二府四县实行“节米”方针，强制采用代食品（杂粮、番薯等）。但是尽管禁食白米，奖励代食品，主食的缺乏仍然日趋严重。“一般人民的食粮被减少到仅能活命。主食从1941年4月起，实行了成年人一日量二合三勺（三百三十克）为标准的定量配给制”[⑩]。后来连这个标准也保证不了。人民越来越陷入饥饿和营养不良。青少年发育的一些基本指标（身高、胸围、体重等）急剧降低，千人死亡率则逐年增加。同年7月7日明令禁止一般饭店卖米饭，9月26日内阁又决定了食粮问题紧急对策。可见侵华战争期间的食粮问题成为经常困扰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大严重问题。大米等粮食紧缺的原因是由于化肥厂大多转作军需生产，导致化肥奇缺，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缺乏劳动力。

③劳动力严重不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侵华战争而

动员的兵力，总数约 300 万人。这些兵员不仅有现役兵，还有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役等役种的士兵，其年龄分布在 20 岁至 39 岁之间，自然都是精壮劳力。特别是派到中国战场上来的有近一半是年龄在 30～39 岁的后备役兵员，这部分人恰是工农业生产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同时，为了使侵华战争持续进行，不但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而且在战地和本土，还需要有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所必需的庞大的后勤保障体系。这就不仅要占用大量精壮劳力，甚至连妇女、儿童也被以种种名义动员到战争中去。1939 年 7 月 15日，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实行国民征用，被征用于有关军工生产部门劳动的人员，“占男女劳力一半以上，可以说全体国民都被动员起来了”[11]。农业更是优先和重点被征用的产业，“1937—1941 年农村劳动力转入军需生产者约 112万人……1937 年日本农村耕地面积为 609万町步（1町步约合 9.2公亩——引者），至 1941年下降为 586万町步，减少约 2300 万公亩”[12]。专业农户从 1937 年的 418万户，减少到 1941年的 230万户，降低了 45%[13]。问题不仅在于农村劳力和耕地的绝对数减少，而且留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力多为老弱妇孺。1940 年以后，日本“到处是……‘生育吧！繁殖吧！的标语”[14]。劳动力缺乏给农业、工业特别是民用工业，从而给整个经济生活乃至国民心理带来深刻的影响。

④财政紧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前的 1937 年陆军军费为 5 亿多日元[15]。侵华战争爆发后，军费急剧增加， 1937 年 32.7 亿日元（9.2 亿美元），1941 年达 125 亿日元（ 29 亿美元），相当于 1936年的 25 倍[16]。仅 1937年 7 月到 1940年底侵华战争前三年半的军费支出即达 245.46 亿日元，按同比值计算，几乎相当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出兵西伯利亚等历次侵略战争军费总和的 3倍。其“国家计划没有到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开始破产了”[17]。除了直接军费以外，政府还要为加速发展、不断翻番的战争工业如钢铁、人造石油以及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产其他战略物资的产业支付数以亿计的巨额补助金，有的产业则给予免税或特别奖励。因此，用于侵华战争的实际开支远远大于直接军费数额。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的国家，其外汇一向入不敷出。日本内阁直接管制外汇交易，原本凡每月 3 万日元以上的外汇交易需政府核准。全面侵华后，“因为情况极端恶化”，到 1937 年 12 月，不得不将免除核准的金额降低到 100 日元，其外汇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8]。经费的紧张更加剧了物资的紧张，不要说还有来自国外的禁运、禁售，即使没有这样的限制，日本也缺乏必要的外汇购买。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平时预算由“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两项构成，但侵华战费单靠正常渠道远不能解决，因而从 1937 年 9 月第 72 次临时会议开始设立“临时军费特别会计”，通过强制发行公债、增加各种税收（提高税率 20%～100%）、强征“北支事件特别费”、迫使国民缴纳“军事费献纳金”等等予以筹措。到第 79 次临时议会，四年多时间，临时预算额总计达 471.3 亿日元[19]。

军火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侵华战争的沉重负担必然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他们不仅受到增税、公债、强制储蓄、献金之累，而且，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活资料严重匮乏、消费受到限制、日常生活被置于严密的高压统治之下，大批民用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或者破产，或者“整理”，员工或者失业，或者被征兵、征用，继续留在生产岗位上的劳动条件也日趋恶化。广大民众与侵华初期统治集团煽动起来的狂热情绪不同，越来越产生幻灭感和对军国主义者的不满情绪，这就加深了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潜力。

以上种种说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军力、物力、人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全面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实的和潜在的战争能力，从 1939 年开始，日本综合国力以每年平均约 10%的速

率逐年递减，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国力的衰退已经达到最严重的时期[20]。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不说明它强大，也不是已有充分准备，而是在被中国四年半抗战拖得疲惫不堪，自身也没有最终获胜的信心，带着极大冒险性的一次赌博[21]。国家间的战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取胜的基本条件无非是强我弱敌。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独立坚持抗战，不仅打破了日本法西斯准备用“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的迷梦，并且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是阻止日本向北侵苏、推迟其向南进攻美英并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前四年半的中国抗战已经从削弱敌人方面为打赢太平洋战争、最终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侵苏战争计划的实现，有力地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

日本早就以苏联为假想敌，侵苏是其既定国策，特别是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更加紧了侵苏的准备，并在 1932 年制定了 1933 年度具体的侵苏战争计划：以伪满洲国为战略后方，开始阶段，以其关东军和朝鲜军为主，在东正面展开攻势，首先击破滨海地区的苏军，压制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的苏海、空军基地，然后将兵力集中于西正面，依托兴安岭与苏军主力进行决战。但是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东北军民抗日战争的牵制。日本著名学者信夫清三郎写道：“数达 36 万人的地方军阀军队（引者按：指以留在关外的原东北军及警察为基础的抗日义勇军）起来进行抵抗，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到进展。到了 1934 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的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 1935 年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因此关东军仍然不得不继续苦于抗日武装斗争”[22] 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对东北

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也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军队……牵制了侵略者并捆住了侵略者的手脚……在东北，日军被迫留住大量关东军”[28]。到1937年，日本陆军又一度打算在6月9日发动侵苏战争[29]，终因有中国这个“背后的威胁”，日军还是未敢贸然行动。

侵华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政策。但侵华也是为了侵苏。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一个月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交的《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明白无误的表露出这一点：“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着重号为引者所加）[30] 狂妄的日本军部极端轻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他们认为只要3个月，甚至1个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然后再发动侵苏战争，这样既可以保障背后的安定，更可利用中国资源支持侵苏战争。但是中国人民的韧强抵抗，使近百万日军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腾不出力量侵苏，日本军部因此而十分焦虑。1938年底～1939年初，日军在侵占武汉、广州后，基本上停止了战略进攻，主要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充实对苏战备[31]。1939年12月，陆军将1936年12月制定的所谓“一号军备”计划做了大幅度修改，为准备侵苏战争，一方面计划从1940年到1944年将地面部队由41个师团扩充到65个师团，陆军航空兵由142个中队增加到164个中队，同时还将大大扩充机械化部队。另一方面打算逐渐从中国战场撤减兵力，以便把物力、财力、兵力集中于对苏战备。1940年春夏之间，日本统治集团受到纳粹德国大败英法联军，席卷西欧，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鼓舞，在“可别误了公共汽车”这种思想指导下，重新策定侵苏战争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关东军的兵力，由原来的9个师团增加到11个，“国境守备队”由8个增13个，在桦太新设了混成旅团。空军战队也由18个增至22个，特别是1941年6

月 22 日希特勒进攻苏联，日军陆军和政界人士乃至皇族集团认为这是打倒苏俄这个明治以来宿敌的“千载一遇”的良机，立即着手代号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关特演）”的侵苏战争的具体准备，迅速向“满洲”调集部队和弹药、燃料等战争物资，关东军 35 万人一下子增加到 70万，成为日本陆军史上空前规模的大动员。“关特演”的原定计划并不是什么演习，而是要从 8月 29 日“作战开始”，到 10月中旬“作战完了”的对苏闪击战。日军甚至拟定了对即将占领的西伯利亚地区的“统治要领”。另一方面，德国也强烈要求日本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让正在德国访问的山下奉文“尽早回国，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27]。战争刚一爆发，希特勒又通知外相里宾特罗甫电示德驻日大使奥托：“您应……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线路（铁路）为当然的目标”[28]。尽管内部的“北进派”、外部的德国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但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日军作为战略侦察主动挑衅造成的张高峰事件、诺蒙坎事件等局部冲突外，始终未能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军部看到苏联的军事、经济实力强大，在苏德战场上遏制了纳粹军队的进攻势头，因而未敢轻易动手。再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对华作战，已经没有余力”。[29] 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 1941年 6月 27 日本营和政府联席恳谈会上回答外相松冈洋右“下决心立刻参加德苏战争，先搞北面，然后再搞南面”的意见时说：“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上办不到”[30]。中国抗战不但使苏联免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且使斯大林有可能从远东地区调出大量精锐部队用于抗击西线德军的进攻。1941年夏秋，苏联从远东方面军和外贝加尔方面军向西线抽调 12个步兵师、5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共 12.2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人。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关键时刻，又从远东抽调了 10 个步兵师、 4 个步兵旅，共 15 万多人。从 1941 年春到 1944 年秋，从远东地区西调的兵力总计达 54.2 万多人，各种火炮 5000 多门、坦克 3300 多辆[51]。这就不仅大大改善了苏联的战略态势，而且直接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战略配合，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或者不待苏德战争爆发，早就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或者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乘机与德国对苏联实行东西夹攻。那样苏德战争的演进过程完全会成为另外一种形态，两个基本上势均力敌的巨人在全力进行殊死搏斗时，只要其中一方哪怕得到一个矮人的援手，另一方都会被打翻在地，何况日本法西斯同样是一个强大凶恶的战争狂人。在苏德战争中，纳粹德国没有得到它所迫切需要的日本的援助和配合，相反苏联人民却由于中国人民承担了上百万日军的巨大压力，而得以将 91％的兵力集中于西线，这也就是说，除了一般边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队，凡是能够机动的野战部队，几乎全部用于对纳粹德国的抗击和反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和巨大牺牲，在苏德战争前换来了苏联（至少是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又使苏联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为赢得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从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最终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之前，苏联人民包括苏联高级将领对此都给予高度评价。崔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52]。20 世纪 50 年代时一位苏联学者说得好：“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

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军的双手束缚住了。从而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38]。

（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推迟了日本的南进，为美国赢得了备战的时间。

前面曾提到日本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而南进，以致最终走向太平洋战争。这里又说中国抗战延缓了日本南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这是双向的，并不矛盾。南进对美与北进侵苏一样，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而且由于军事体制的二元化（陆军、海军各自独立，中央缺乏强有力的一元化统驭）决定了其对外扩张政策，即战争政策的二元化。以海军为主要代表的南进论（陆军内部也有南进论者）和以陆军为代表的北进论经常争论不休，反映在阶段性政策上，常有变化。在二战期间，政策和战略变化的枢轴则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正如 1940年 7月 8日，日本特使佐藤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日本政策的极为复杂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这个战争不解决，日本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行动”[39]。由于日本陷于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它就被逼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解决“中国事变”，就要切断中国与外部的联系（受援通道），并从南方获得大量战争资源；要南进，就不可能避免同英美的战争，而陆军的大部分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只靠有限的机动兵力，没有充分的取胜把握。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 1940年 7月 27日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也反映出，日本实现南进夙愿的中心问题和最大障碍仍是“中国事变”。为此，在考虑“对南方行使武力”时，规定了两种方案：“一、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应在不至于同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形势“特别有利”时，才可能对南方“行使武力”[40]。可见，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顽

强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就可以轻易地“处理完中国事变”，那么，日本法西斯的“武力”必定会“抓紧时机”，更早地“行使”到英、美头上。

推迟日本南进这一点，对于美国具有特殊意义。美国虽然有巨大的战争潜力，但是由于“二战”前和“二战”初美国国内政坛的孤立主义、笼罩全国的和平主义情绪，大部分人反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而并没有积极备战，巨大的战争潜能并没有变成现实的战争遂行能力。真正为支援和直接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而进行大规模扩军备战还是 1940 年夏秋间的事，在此之前陆军只有 20 多万人，直到 1941 年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对比仍居劣势：美国在这一地区只有不足 92 万吨舰艇和 716 架飞机，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舰艇却有 101 万吨，飞机 1500 架，而且至关重要的航空母舰也少于日本。直到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实力仍然超过美、英、荷三国的总量[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在 1940 年底曾说过：“从现在起，我们对日本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时间以准备我们的防务”[⑨]。正是中国的抗战为美国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仅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 11 个月时间，美国飞机产量增加了 70%，其中战斗机增加 1.4 倍，坦克增加 22 倍，火炮增加 2.8 倍，美国在太平洋对日劣势有所扭转。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假如中国在抗战初期像西欧的一些国家那样很快投降，而令日本提前到 30 年代末发动太平洋战争，则美国在战争初期必将输得更惨，而且日本除了占领太平洋上大小岛屿之外，还会“攻占美国对日反攻的最大据点澳洲”[⑩]，甚至美国本土也会遭到进攻。若果如此，最后胜利虽然会属于同盟国，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肯定会付出更高的代价、更大的牺牲。丘吉尔后来说过：“德国苟于 1940 年法国崩溃之后即试行进攻英伦三岛，日本苟于同时对英帝国及美国宣战，则吾人所受的巨祸及苦痛之深殆不

可设想矣”[3]。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对盟军作战进行了有力的战略、战役配合。

1. 中国人民继续坚持抗战，打破了日军与德军东西会师的战略图谋，保证了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现，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苏中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两大阵营的搏斗。在这场影响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历史性大搏战中，中国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位于西欧北非和苏德两个西方战场与东方的美日太平洋战场之间，阻断了日本和德意军事同盟的空间联系，使这个同盟在军事上陷于有名无实的状态，形不成有机结合的军事集团，无法采取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因而发挥不了本应具有的同盟效应和联合作战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场具有枢轴性战略意义。日本和德意早就痛感这一点，企图从南北两线打通它们之间的军事联系。北线企图夹攻苏联，达成两军会师于西伯利亚，因受阻于中国抗战而未能实现，这已如前文所述。南线，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战告捷后曾打算夺取锡兰，在印度洋与德军会师。德国也于 1942 年 3 月要求日本占领印度南面的锡兰和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以便通过印度洋，会师中东，使欧亚两大战场连接起来。同时派隆美尔进军北非的的黎波里，与日军的印度洋作战相呼应。德国这时还又一次要求日本配合德国 1942 年对苏联的大举进攻，先攻占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西向贝加尔湖，共同打败苏联，再打垮英国，迫使美国低头，最终夺取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轴心国这个计划虽然十分“宏伟”，但他们以蛇吞象，心有余而力则绌，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战场是其不可逾越的障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虽然可以将海军主力投入太平洋方面，而陆军主力却仍然胶着在中国战场。当时日本陆军共有 51 个师团，投入太平洋

战场的只有 11 个师团，其中作战部队 25 万人，加上后勤保障人员，才 40 万人，仅比英美荷在该地区部队（约 30 万人）略多一些。而陷在中国战场的陆军（含关东军）则达 35 个师团、140 万人。这样无论北线、南线，轴心国都无力实现欧亚战场连接、德意日协同作战的战略企图。

与此同时也就使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美、英鉴于德国是法西斯第一强国，如首先打败德国，则意、日自然容易打败，若先打败日本，然后解决德国，仍然会很棘手，因而在 1941 年 12 月确定了“先欧后亚”战略（实际执行的结果是美国在欧洲以陆战为主，在太平洋以海战为主），但推行这个战略的前提是要有一支巨大的战略力量，牵制住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强大陆军，恰恰是中国人民束缚住了这条苍龙，使之无力左顾旁骛，否则，日本侵华的一百多万陆军及所属航空队一旦从中国解脱出来，或经西伯利亚，或经印度，都可乘苏美与德意鏖战之机长驱西进，与德意会合，或者苏美英不得不分兵拒止日本，而给德意以可乘之隙。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必将给反法西斯阵营造成严重困难，至少，会推迟胜利的到来，历史证明美国在二战中的“先欧后亚”战略是对头的，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意味着比起“先亚后欧”，要在已经孤军苦斗了 4 年多之后还得撑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更多的牺牲。中国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赢得了同盟国的一致肯定和赞誉。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一向轻视中国抗战，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40]。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2 年春）就曾对他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

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41]。正是因为中国人民阻止了罗斯福所描绘的一系列灾难性局面的出现，使他在 1945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充满感激之情地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42]。

2. 中国抗日战争，除了宏面上打破了轴心国的战略企图、从一个特定方面保障同盟国战略计划的实现这种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配合以外，还从多方面对亚洲太平洋战场的盟国军队进行了许多具体的配合，或者派部队与盟军并肩作战，或者由于中国战场的有力存在而对局部战区的战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前文中罗斯福提到的关于日军攻占澳洲问题，可作为后者的突出例证。1942 年二三月间，日本陆、海军曾就是否攻占澳洲展开争论，海军力主攻澳，陆军则坚决反对，理由是攻澳兵力除海军兵力外，“陆军方面需要以 12 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根据情况还有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陆军兵力。”“这就需要大幅度缩减满洲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43]。这说明日军在亚太战场上，凡涉及动用陆军较多兵力的战役计划，都不能不考虑中国抗日战争的强大影响，从而使日军不能放胆展开大规模的陆地战役行动，这不但保全了像澳大利亚、印度等重要的国家和地区本身，同时也使盟军得以保有反攻日军必不可少的战略基地，在缅甸等地沦陷于日本之后，就更是如此。盟军反攻作战所需物资以及人员的训练大都在我国西南大后方进行，美国航空队对日占区乃至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也以中国浙江、四川、广西等地的机场作为基地。

中国军民不但在中国大陆扭住日本百万大军，而且还派出远征军到印缅战场直接与盟军进行协同作战。1942 年春，缅甸英军遭到日军第 15 军进攻，形势危殆。早于 1941 年 12 月

编成待命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三个军、九个师共 10万官兵，应英缅军总司令胡敦请求，开赴缅甸。孙立人第 38 师在仁安羌救出被日军围困数日，弹尽粮绝的英军一个师及装甲旅残部7000余人，在英国人民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由于英方违约不按共同协议的计划作战，再加上指挥紊乱，远征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伤亡 200 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以下 6 万余人，余部一部分转入印度，一部分回国。 1943 年，重建的中国远征军和经过扩充整训，采取美式装备的中国驻印军与盟军协同配合，在缅北、滇西进行了反攻作战。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前后近一年半（1943年 12月～1945 年 3月 30 日），共毙伤日军 3.1万多人，缴获步枪近万支，汽车 860 余辆，同时收复缅境 5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 50 多座大小城镇，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胜利完成了反攻任务。中国第二次远征军为配合缅北反攻发动的滇西战役，历时 8个多月（1944 年 5月 ～1945年 1月），歼灭日军 2万余人。缅北、滇西战役不仅消灭了五六万名日军，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中印、滇缅两条具有极大战略意义的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的陆上封锁，美国援华物资和美国驻华航空队所需各种物资，大量增加，源源不绝地由此运进，既充实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又增强了美在华航空队远程轰炸台湾、琉球乃至日本本土的能力。同时由于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和中国战区其他地方的、特别是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迫使防守太平洋各岛的日本陆军减少到陆军总兵力的 15％。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两次在印缅战场的作战，对于上文提到的盟国粉碎日本与德、意之间打通南线，建立直接军事联系的企图，也起了更为直接和具体的作用，自不待言。

（五）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及辉煌的战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大贡献。

有的西方学者说“中国人民没能力保卫自己”，“国民党军

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战斗”[44]这不是偏见，就是无知。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军民在抗战8年间，始终牵制着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百万以上的日本军队，并使其战争能力遭到巨大消耗。据日本大藏省编《昭和财政史 4》所列各区“临时军费”（战费）1941 年至 1945 各年度支出额推算，日本在中国大陆（包括东北地区）的战费支出额占其除日本本土以外的各区（中国大陆、朝鲜、台湾、“南方”印亚洲太平洋各作战地区）战费支出总额的 67.79％，这就是说，2/3 以上的战费被消耗在中国战场。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中国军民广泛、持久、英勇、顽强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在“北进”、“南进”、西攻，到处都需要重兵的情况下，而在中国闲置百万大军的，中国人民无日无时不在同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紧紧捆住了日军的手脚。仅以国民党正面战场而言，一次投入兵力数十万规模的会战 22 次，重要战斗 1117 次，较小的战斗 38931 次[45]。以 8 年 2981 天计（1937.7.7～1945.9.2）平均每天 13 次多。8 年共毙伤日军 240 多万[46]。因此，说“国民党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战斗”是没有根据的。诚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 1941 年以后，逐渐消极避战，拿出相当大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大量成建制的国民党军队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投敌伪化，如中缅印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国民党将领和军官腐败盛行，妨碍和影响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做出本来应有的更大的贡献，这是国民党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毕竟不是法国的贝当政府，而是最终将抗战坚持到胜利，而且在此期间也还组织了十余次会战， 500 余次重要战斗，虽然有 1944 年豫湘桂会战那样并非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应有的惨败，但也打过如江西上高、第三次长沙等取得较大胜利的会战，广大爱国官兵们仍然坚持与日军浴血奋战，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